

20

世纪潮人文化萃英

主编 黄赞发 陈粹权

曾宪通

学术文集

20 SHIJI
CHAOREN
WENHUA
CUIYING

汕头大学出版社

曾宪通学术文集

曾宪通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宪通学术文集/曾宪通 著.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7
(20世纪潮人文化萃英)

ISBN 7-81036-336-0

I.曾… II.曾… III.曾宪通—文集 IV.H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3412 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汕头市达濠新兴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200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5

字数:403千字 印数:1~1000册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20 世纪潮人文化萃英(丛书)

总 序

21 世纪就要来了,站在这世纪之交,前瞻以迎接新的时代,回眸而反思百年风雨。20 世纪的大潮汕,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根本转型的大背景上,随着时代的大潮,挣扎、奋斗、革命、建设,几代潮汕文化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交融中进行着自身的辉煌创造,涌现出一批批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文化巨子。

潮汕地处粤东,苍苍南岭,茫茫南海,天限疆界,既是保护圈,又是封闭线,素有“粤东门户、华南要冲”之称。据考古发现,这一片仁厚的大地,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创造了史前的文明,而潮人文化的真正形成则源自秦始皇之揭岭戍兵,东晋文明的南传,特别是唐代陈元光、韩愈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渗

透,一句话,在潮汕本土与中原母体文化的交融中创造了潮人文化的第一次辉煌。宋元以迄明清,古代潮人文化在继续磨合中取得了灿烂的丰收,乃至“海滨邹鲁”、“岭海名都”等盛誉接踵而来。而近代以来以马列思想为主流的西方文化的输入,几代吮吮、咀嚼着儒家理学文化成长的潮汕文化人,尤为难能可贵地取积极回应的态度,主动接收而又不失故步。他们扎根传统,面对世界,潜心学问,深入生活,广收博采,厚积薄发,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文学及艺术创作,几乎所有传统和现代的学科中都有所建树,出现了杜国庠、饶宗颐、许涤新、秦牧等等这样堪称一流的文化名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民族的心理,是一种民族内在韵趣的集中体现。潮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20 世纪潮汕文化人孜孜以求的耕耘中结出了一个既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又表现潮汕地方特色的思想文化硕果。《20 世纪潮人文化萃英》(丛书)的编辑出版,也就是力图捕捉近百年来几代潮汕文化人在艰辛的文化旅途探索中所迸发出的思想火花,以闪亮

一条新一代潮人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之路。

有关这些潮籍文化巨子思想的文章过去在报刊书籍或已有过展示,但以丛书形式集中地从多角度作大型介绍尚属首次。杜国庠对传统哲学的审视,表现了马列主义者对历史的睿智,许涤新、萧灼基的思考表现了几代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求索,饶宗颐对东方文化底蕴的叩问表现了包融东西的博大与深沉,詹安泰揭示词曲小道所蕴涵的传统的韵致与当代的情怀,还有潘懋元、秦牧等等,真知灼见,各具风骚。正是这些能工巧匠同众多的潮人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以中华优秀的理性文化传统为本位,以当代世界的科学文化为前沿,完成文化的交融与创生,体现出广阔的视野和超越的意识,科学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表现出宽广的文化胸怀和价值境界。从而,共同托起了潮人文化的第二次辉煌。

我们来到这样的历史坐标之上,处于世纪之交,传统与未来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百年沧桑与三阳开泰之间;柳暗花明与一马平川之间。在回顾与前瞻的瞬间,我们分明感到任重而道远的深刻内

涵。南海之滨的潮汕,万里波涛对现代人来说,八面来风,正是又一次开放与回应的良机,潮人文化在 21 世纪必将赢得第三次辉煌。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旨在为弘扬潮人文化尽心尽力。如果说这批潮籍文化巨子的思想如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努力把它们串成一条耀眼的珠链,集中显示出 20 世纪潮人文化的精华,以改变人们对潮人文化精细灵巧有加而博大恢宏不足的印象,给世人与历史奉献出一份既属于所有海内外潮人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品。

黄赞发 陈梓权
1997 年金秋于汕大

我和古文字研究(代序)

1955 年秋,我从汕头金山中学毕业,即考进号称华南最高学府的中山大学念书,在康乐园里度过了第一个中秋节。当容庚教授和夫人将同大家一起赏月的消息传来,宿舍里一片欢腾。记得当晚皓月悬空,全班同学围坐在东大球场的绿草坪上,一边品尝着广州五仁月饼,一边听着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和夫人聊聊康乐园的故事。康乐园原来是岭南大学的校园,因在珠江边的康乐村而得名,而康乐村则据说同谢灵运(康乐)到过附近的下渡村有关。1952 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从此便成中山大学的校园了。容庚先生就是这样从岭南大学来到中山大学的。同学们都知道,容庚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但当时许多同学都不知道古文字为何物,便七嘴八舌地向容先生讨教。容先生答得很风趣,他说:“所谓古文字,就是我们的老祖宗用过而你们今天还不认得的字。”但他把话锋一转说:“要学会古文字也并不难,我当初学钟鼎文时还不是个中学生?”接着,他便断断续续地向我们介绍他自己如何在舅父邓尔雅的影响下学习《说文》,如何同弟妹们分工搜集古文字资料编书,又如何夹着《金文编》稿本谒见了考古学家罗振玉,进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毕业后又如何进入燕京大学成为教授的,等等。容

先生这次讲话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大家明白他是怎样通过研究古文字,才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生一跃而成为鼎鼎大名的大学教授的。当时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分别设有语言学和文学两个专门化方向,开设的课程几乎有一半是语言文字学的。在系里多位语言文字学家的影响下,我开始对历史悠久的传统语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修习了语言文字学系列的全部课程,用心钻研,并惊奇地发现,在整个学术的殿堂里,还有语言文字学这块宽广无垠的天地,渴望着窥探其中的奥秘。

1959年暮春,容庚先生带领四位副博士研究生北上实习,学校让我提前毕业作为容庚先生的助手随行。这次实习历时两个多月,在全国各大博物馆和文物工作队看到了许多传世和新出土的珍贵文物,还拜会了多位向往已久的著名学者和专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唐兰和郭沫若两位先生。当时我们一行住在故宫博物院的西角楼招待所,经常在故宫的金石室里见到唐兰先生。容先生一见面就批评唐先生光守着故宫大批青铜器,不编图录供大家使用。而唐先生总是笑呵呵地回答说:“编图录不算研究,这不是我的工作。”还经常对我们说:“古文字的功夫,不在古文字之内,而在古文字之外。”这使我朦胧地意识到,研究古文字,并非仅仅认识几个古字那么简单。有一天,故宫博物院院长通知我们,郭沫若先生准备在前海家中接见我们,令我们非常高兴。原来,郭老二三十年代在日本研究古文字时,就与容庚先生订下文字之交。这次一听说容庚先生带学生到北京实习,便欣然答应会见。记得当时郭老刚从安阳考察回到北京,便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安阳圆坑墓的发现情况,并回答了我们一行提出的许多学术

问题。谈及当年在日本研究过的某些器物 and 拓本,他真的如数家珍,记性特好,令人叹服。这次随同实习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大批老祖宗用过的古文字实物资料,眼界大开,知道要在古文字学领域里有所作为,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学识,尤其要了解与古文字密切相关的历史、考古和古器物等背景资料,光靠课堂上的学习和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1959年7月,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正式毕业,组织上分配我留校在古文字研究室工作。当时古文字研究室除容庚先生外,还有商承祚和方孝岳两位教授,系领导让我担任容庚先生的助教兼任古文字研究室秘书,协助室主任商承祚教授开展日常工作。当我向容庚先生报告自己被留校当助教时,没料到 he 竟给我大泼冷水。他说:“现在提倡‘厚今薄古’,批判‘厚古薄今’,青年人何苦来钻这个冷门?”后来,他见到我并没有动摇,便把他妹妹编著的一本《金石书录目》送给我,还无私地开放他那著名的“五千卷金石室”供我自由地阅读。叮嘱我把他的藏书记号移录到自己的书上,以便按图索骥。并布置我临摹《说文解字》、《金文编》和《甲骨文编》三部字书,细心比较其异同,留意某些器物上的特殊写法。他常对我说:“大匠予人以规矩而不能予人以巧,巧,只能在刻苦的磨练中得来。”又说:“一个人要做学问,光靠平日博闻强记是不够的,必须借助‘目录’一类的工具书作为治学的阶梯。这本《金石书录目》你要好好地加以利用。”容庚先生的爱护和鼓励,使我明白做学问也同爬梯子一样,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善于学习,勤于探索,一步一个脚印地循序渐进,才能达致科学的顶点。

1961年深秋,商承祚教授带领王子超同志和我到郑州、北京两地,摹校信阳楚墓出土的竹简。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

期,每天靠大蒜送玉米粥糊口。一向养尊处优的商先生毫无怨言,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于地下库房与资料室之间,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商先生对残简拼接和简文临摹十分用心,有很丰富的经验。他认为残简拼接要注意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协调。内部条件指字形和文意。同一个字的用笔体势往往因人而异,同篇文章的文气也必然是上下联贯的。属于同一写手所写的字而又上下文意通达无碍是拼接残简最基本的条件,再参照字形的大小,字距的疏密和残简断口的形状,以及相关的花纹色泽等外部条件,即可作出判断了。商先生说:“具备这些条件的拼复工作,是往往可以做到十拿九稳的。”商先生对于简文的临摹,则主张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先无我然后才有我。所谓“无我”,是要做到完全客观地将所见的笔画都准确地临写下来,而不管其对与不对;所谓“有我”,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判断其笔画和结体是否符合规律,然后决定如何取舍;对于笔画漫漶不清和残缺不全的字,尤其需要反复斟酌和推敲。商先生的这些理论和方法,成为我们日后整理竹简的指南。

196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介绍容庚先生到全国各地搜集青铜器资料,准备改编容庚先生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一书。改编小组成员除张维持、马国权两位先生外,我也忝列其中,陪同容庚先生到全国十四个省市作学术考察。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搜集到大量的青铜器资料,回校后即着手改编工作,有若干篇章已经写出初稿。但苦于后续资料不济,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遂告中断。一项行将实现的宏图大略,终因不可逆料的原因而宣告夭折,实在是中国学术界难以弥补的莫大损失。

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是我开始跨进古文字学门槛的十年,这段时间的许多日子,都是在容庚、商承祚二位老先生的身边度过的。二位前辈长期从事古文字资料的搜罗和撰集工作,他们擅长字形分析和注重实证的严谨学风,对我影响至深。特别是容庚先生一贯倡导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精神,至今仍是自己克服困难的座右铭。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 1974 年初夏,当时正是新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继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书出土之后,又发现了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些都是轰动中外学术界的重大考古收获。在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调来了一大批著名学者组成秦汉简帛整理小组,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初,我是作为商承祚教授的随行人员加入这一行列的。说起来有点偶然。我本来并不是这个小组的正式成员,有一次,我在翻阅罗福颐先生初步整理的简本《孙子兵法》,在一篇名为《形》篇的简文中,发现不少句子总是重重复复地出现。对于这一现象,我提出可能存在两个写本的看法,得到朱德熙先生的支持,朱先生嘱咐我试着按照不同字体重新加以整理。这样一来,原先重复出现的简文果然按照不同写本各就各位,泾渭分明,不再重复出现,证明确是两个写本无疑。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了不少与《孙子》十三篇有关和《孙子》佚文的残简。因而,朱德熙先生建议由我负责继续整理简本《孙子兵法》,并以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与简本相校注。随后,我又参加了简本《尉缭子》校注,《孙臆兵法》简注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等。直到 1976 年夏天,北京发生了强烈地震,才离开北京

返回广州。在北京期间,我不但接触到一批批十分珍贵的新出土简帛资料,还认识了许多全国一流的老专家,以及同辈学者中的众多佼佼者,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高尚的品德和可贵的学识,明确了自己治学的方向和目标。这对我一生的学术生涯是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别是在整理临沂汉简的过程中,在朱德熙先生的领导下,与裘锡圭、李家浩、吴九龙等同志同在一组,常在一起讨论残简的拼接、编联和文字的考释、通读等问题,受到很大启发。朱德熙先生研究古文字的特点是重视字形而又不囿于字形,他注重透过文字符号去了解较为隐蔽的语言事实,这样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出土文字资料的释读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光从字形上看问题,往往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就在这个时候,朱先生常用的口头禅是:“换一个角度看看怎么样?”他的意思是,不妨从文字背后隐蔽的语言事实来考察。这样一来,往往就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令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想,这就是语言学意识的效应。在古文字资料的释读上,有没有这个“意识”是大不一样的。它使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多了一条思路,多了一个角度和一条门径。这对于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79年的初冬,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广州举行第二届学术年会,由商承祚教授担任本届理事会理事长,我任秘书长兼负责操办具体的会务工作。这届年会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老一辈的古文字学家到得最齐,除容庚、商承祚两位先生外,还有于省吾、徐中舒、顾铁符、周祖谟、孙常叙、胡厚宣、张政烺、朱德熙、沈之瑜、启功、张颔等先生,相聚一堂,盛况空前;二是开始有海外学者出席会议宣读论

文。国际著名的汉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就是首次回国参加学术活动的。当时的广东省领导吴南生书记特地设宴欢迎饶宗颐先生的到来。他希望饶宗颐先生今后多回内地看看,还指着我说:“必要时可叫宪通陪陪,这也是向饶老学习的好机会。”第二年秋天,饶宗颐教授应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的邀请,在往成都出席第三届古文字学术年会后,即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当时,文物出版社派郑昌政同志专程到成都迎候,我也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行人员一路陪同。从成都出发,先后到过宝鸡、兰州、敦煌、西安、洛阳、开封、郑州、武汉、荆州、奉节、宜昌、安阳、北京、承德、济南、泰安、曲阜、南京、扬州、镇江、常熟、无锡、苏州、上海、杭州、衡阳、广州等地,历时三个多月,行程达数万里。饶宗颐先生回香港后,特意刻了“九州行其八”、“五岳历其四”两枚印章作为纪念。在这次旅行中,饶先生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接触到大量新出土的文物,兴奋异常。由于先生对楚地文物情有独钟,在考察过程中,即拟定“楚地出土文献研究”这一课题,邀我共同研讨。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共同完成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部著作。饶先生是位“博古通今,中西融贯”的大学问家,在我有缘随侍左右的二三十个月里,饶先生总是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令人如沐春风。在此期间,除了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容向饶先生请教古代数术、乐律和天文历法之外,还领悟到不少治学的门径。就有关研究地下出土文献而言,饶先生不但主张要释文字、明义理,更强调要从文化史的高度,明因果,溯源流,窥探人类文明发展的轨

迹。饶先生非常重视“三点论”，即掌握焦点，发挥特点，尤其着力于关联性的层面和“问题点”的研究，即把研究对象的相关事物尽可能汇集起来，从纵的时间方面探讨其产生、衔接的先后层次，从横的空间方面考究其交流、传播和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进而从错综交叉的关系中寻找其说明种种现象的内部规律。正是饶先生这种追溯文化渊源的强烈意识和不知疲倦的求索精神，一直激励着自己不断地探索和进取。

以上是我研习古代文字的三个阶段。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是三次机遇和三度升华，即培植根基——明确方向——把古文字研究同古代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在长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古文字学为主体，以战国秦汉文字为重点的研究方向，在方法上，注意从字形入手，联系词的音义，掌握古文字资料的内涵，进而窥探语言、历史、文化等现象与规律，揭示其中底蕴，从微观以窥宏观。尽管本人的研究成果很有限，但我相信自己的路子是走对了的。这应归功于我的老师和多位长辈对我的关爱和悉心的指导。在他们的向导下，我才能够在这块古老而布满荆棘的园地里不断地耕耘和收获。归纳起来，我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所作的工作大体上有如下几点：

一是关于汉字起源的探索。汉字起源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课题，前人已经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工作，必须用今天的眼光和新的材料重新加以审视和补充。我在《汉字起源的探索》一文中，扼要地概述了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各个领域探讨汉字起源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成果，发现四个方面的材料不但可以互相印证，而且可以互相补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各个领域揭示的汉字发生史的进程是大致相同或相近

的。它们从多角度、多层次证明一个事实,作为中国文明重要标志的汉字,是在中国本土上土生土长的。

二是关于古文奇字的考释。其中涉及甲骨文、金文、简帛文、陶玺文和传抄古文等。考释古文奇字是古文字研究者的基本功,我的做法大体如下:(1)根据早期文字的构形,追溯其初形与溯义;(2)按照该形体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用法,探索其音义互动和演变的轨迹;(3)从形的分化、义的引伸和音的转移考察文字孳乳、繁衍与同源的关系,为字族的研究提供可靠的线索;(4)联系古籍记载与出土文献挖掘汉字所蕴藏的文化内涵,阐明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汉字体系,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含义。拙文《说繇》、《说踳毳及其它》、《“作”字探源》、《从曾侯乙编钟之钟虞铜人说虞与业》、《论齐国“遯盟之玺”及其相关问题》、《释“凤”“皇”及其相关诸字》以及《楚文字释丛》等,都是力求本着以上的原则探究的。

三是关于古钟铭和古乐律的研究。共有三组文章:第一组是对宋人著录钟铭的重新诠释。其中一件见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拙文《吴王钟铭考释》首次对薛氏称之为“商钟四”的鸟虫书铭文加以辨证和疏释,认为该钟并非商钟,而是吴王僚于鸡父之役后所作的铭功重器,应称之为吴王钟。随后,董楚平、曹锦炎两位先生在拙文的基础上进行考释,使铭文大体上得到通读,他们都认为是越王之钟。另一见于王厚之《钟鼎款识》的“楚公逆罍”。我在《宋代著录楚公逆钟铭文补释》中,根据山西晋侯墓地新出的楚公逆钟铭文,对宋人著录而争议最多的楚公逆钟拓本,重新加以甄别和考释,在排除种种非笔画因素之后,参照同人同时所作的新出土楚公逆钟铭文的文例,使宋拓全铭4行35字得到合理的诠释。

第二组是对 1955 年安徽寿县蔡侯墓所出残编钟铭文的重新排定和考释。这套残编钟因出土时铭文漫漶残泐,旧以为是蔡侯钟。拙文《吴王光编钟铭文的再探讨》根据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保存的一份原拓本,对残编钟的铭文重新加以拼接和释读,证明其实是吴王光编钟。第三组是对曾侯乙编钟铭辞的解读。通过综合分析这套巨型编钟的标音铭和乐律铭,阐释曾侯乙编钟音阶名的体系;进而按照其音高体系的序列,将四千余字的乐律铭统一编排,全面释读,是一种以简驭繁,可以互相挾发和证明的释读法。我在《曾侯乙编钟标音铭与乐律铭综析》一文中,指出曾侯乙编钟音阶名的构成,是以五音为主体,以三度音为纽带的十二音位体系。十二个半音与十二律两两相配,可以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说明战国初期的乐律学,已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极高的水平。

四是关于战国秦汉简帛的研究。其中涉及湖南长沙子弹库的楚帛书,仰天湖、长台关、望山、包山、郭店等地的楚简,睡虎地的秦简,临沂银雀山的汉简和马王堆的帛书,以及敦煌、居延汉简等。除对简帛相关的字词加以疏释之外,还论及楚帛书的神话系统,楚月名和秦汉时制,楚简所见楚国的卜筮祭祷制度,昭固墓的年代和马王堆三号墓的墓主人,以及古代简帛制度和文字书法等等,对于楚国和秦汉时代竹简帛书的文化内涵,有所揭示和阐发。

五是关于中国古文字学发展史上若干问题的探讨。如《清代金文研究述评》、《四十年来中国古文字学新发现的学间》、《建国以来古文字研究概况与展望》等,着重总结某一历史时期的成果和经验,还对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以及容庚、商承祚、饶宗颐等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道路和治学方法,作